

Laura y Julio

对镜成三人

〔西班牙〕胡安·何塞·米利亚斯 著 周钦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Laura y Julio

对镜成三人

〔西班牙〕胡安·何塞·米利亚斯 著 周钦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镜成三人/[西]米利亚斯著;周钦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302-0989-9

I.对… II.①米… ②周… III.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030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3621

LAURA Y JULIO by JUAN JOSE MILLAS

Copyright © JUAN JOSE MILLAS, 2006

MERCEDES CASANOVAS AGENCIA LITERARIA S.L.

@ 2009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归北京出版社所有

西班牙当代文学经典小丛书

对镜成三人

DUIJING CHENG SANREN

[西班牙] 胡安·何塞·米利亚斯 著

周 钦 译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50 × 1168 32开本 5.75印张 98千字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0989-9

I·960 定价:16.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西班牙当代文学经典小丛书”总序

陈众议

要在浩如烟海的当代文学中遴选经典很难，为诸如此类的经典作序更难。首先，经典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或高雅，或古典，经典犹如权威，是一种文化标杆、认知标杆、价值标杆、审美标杆；但同时它既是传承的，又是变化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普世的，又是个别的。因此，何为经典，一是时间说了算，二是读者你说了算。桑塔亚那说过，经典不在于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真正喜欢者的喜欢程度。此言颇似人们对于爱人的界定。

但作为学者、编选者，我有自己的看法。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性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为所有

的经典加上了相对的问号。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多元和自由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多元可以是对抗强势文化侵蚀的一种自我守望，也可以是一种敞开胸怀的来者不拒。当下弥漫着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和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说是后者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表征。首先，用多元化概括我们的文化市场也许很不为过。你看那千姿百态的图书、五光十色的碟片、琳琅满目的广告、鳞次栉比的网吧，还有缤纷的花边和八卦，甚至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等等各式新闻人物，绝对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也绝对无法再用一种或几种主义、一种或几种功能去界定当前的文化现状，更加无法在一纸随稿中描述它的纷杂无序。因为我们面对的似乎已经是一个“多元”的“无主流”大汇唱时代，也即自由的时代、相对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于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之说不胫而走。正因为多元和纷杂，文化丧失（很大程度上是放弃）了凝聚人心、统一认知和行为方式、平衡价值和审美取向的作用。而相对统一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价值和审美取向的缺失，又使文化从众生供奉和仰视的神殿上滑下而走向人性赋予它的另一个极端：个人的心志和情感。这种个人化表演固然始终存在，但一直被人们赋予文化并转而赋予作家、艺术家的崇高和伟大的光环（如人文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等）遮蔽

着。而今，国家、民族、阶级、种族依然存在，但人们（从作者到受众）似乎愈来愈陶醉于自我，也即过去我们羞于谈论的那个始终带着原始基因的“小我”。

凡此种种多少具有模糊视听、消解真理的效果，极易使人觉得这世上再无客观标准可言。然而，这些思潮或思想削弱和消解的并不仅仅是文化或人文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而且还有更为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说穿了是跨国公司和“人权高于主权”这类典型的跨国资本主义思维与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如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有所持守，比如更加重视文学和人文传统。而加强文学经典的研究无疑是我们知己知彼、进退中绳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我们构建正确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最佳参照之一。文艺复兴以降，一方面西方社会的许多重要社会文化思潮往往首先是文学思潮，是由对文学及文学经典的重新诠释散播的；另一方面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又往往与时代社会相悖，具有超时代特征并每每扮演着时代的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文学不仅可以透视时代社会，而且也是厘清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最佳门径。

多元并非完全不好，但前提必须是建设性的，即丰富民族文

化、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而不是相反。

记得庄子寓言中有这么一则，谓祝史在杀猪祭祀之前，曾彬彬有礼、声情并茂地对猪说：“猪啊，我告诉你，我将用精饲料好好地喂你三个月，再为你梳洗沐浴，最后我还要亲自为你斋戒三日。我还为你准备了上等的祭盘，那可是嵌金镶玉的哦。”

难道说别人送来的“好处”不是“祝史说猪”。

于是我想到了经典对于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方面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这听起来非常有悖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端个人主义。虽说完全的忘“我”——忘却“小我”是不现实的，有时甚至是不人道的。但极端个人主义必定导致认知方式、价值标准和审美诉求的相对与多元（二者相辅相成）。试想：倘使跨国资本及其代言者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成为共识，世界又将如何？显然，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只有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提出。在这个跨国资本横行的时代，自由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文化的多元和相对其实都是双刃剑。因此，在这个时候弱化人文研究和文化导向、不思进退中度对谁有利？答案自然也是不言自明的。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摆在弱国面前的的是一个两难选择：拒之，将丧失机遇；拥之，将丧失自我。

那么文化多元和相对何以也是双刃剑呢？一如自由民主在西方往往是富人的特权，而饭碗才是贫者的第一需求；弱国在跨国资本横行的世界里其实并没有多少自由的空间和回旋余地。由此推导，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在强弱分明的世界，自由究竟对谁更为有利？——便有了答案。跨国资本是自由和自由市场的最大受益者。各国人民被日益卷入它的世界市场网，从而跨国资本主义制度也便日益具有了国际的性质。（详见马克思的《资本论》）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文学也罢，狭义的文化也罢，归根结底是精神产品，是一时是地人心、民心的反映。既要顺乎民心，又须因势利导，这是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化人必须时刻关心和探讨的问题。这是因为，在相对的时代、多元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重视人文研究尤其是重视人文导向事关国运。

首先，文化的相对和多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或者“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凡事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因为世上的事情的确往往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长短好坏。20世纪，随着相对论的提出，朴素的道理得到了科学的论证。于是，人们无不拿相对说话，甚至把20世纪说成是相对论时代。相对论的时代必定是价值多元的时代。于

是，从由来已久的文化保守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古今东西，一切的一切正杂然并存于当今世界。于是，“后”潮奋涌，却大都指向不确定性或虚无主义。然而，生活在我们这个还有国家、民族之分，是非、正邪之争，强弱、美丑之别的世界里，利益实实在在。因此，除了要有一般的真理观，还需要有起码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审美诉求和行为准则。这恰恰也是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或可使人处变不惊、见多不怪。

然而，强调自主并非要排斥不同。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真与假、善与恶、美与臭、传统与现代、崇高与滑稽以及介于其间的一切变奏都并存于斯，才更需要了解和甄别、互通和借鉴。这也是“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多元赖以并存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文化的一个固有的和潜在的功能将日益彰显并得到关注：发现无数“小我”组成的地区的和民族的相对特质。否则世界必将是一片令人惶恐不解的混乱。

其次，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经典往往是各民族基本价值观和审美方式的反映，因而也是各民族特性的核心因素和基本认同的情感纽带。这种核心因素和情感纽带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它们既是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基础，同时也是使

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精神基因。大到世界观，小到一般生活习惯，文化起着精神基因的作用。换言之，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相对独特的染色体。这种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的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自己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鲜明个性。然而，也正因为这种不断变化的和不可淹没的个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才变得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他者研究和了解、交流和借鉴。作为精神产品，文化终究是一时一地的人心、民心的集中体现，是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的认识观、价值观、审美观的综合反映。因而，它们常常是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

从另一方面说，无论多么高级、多么社会，我们总还是动物，有一切动物的基本根性。我们之所以高级则恰恰是因为我们具有超乎其他动物的认知水平、审美水平、工具制造和使用水平等等，以及更为丰富复杂的情感及情感表现方式。而这些都是后天的，是需要经过传承、修养才能够达到的。狼孩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和果蝇两种基因图谱的相似性也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是后天的，文化的传承和感知也就变得非常地重要。尽管程度不同，当我们吟颂李杜或任何经典诗人的名句时，想到、感到或萦绕于潜意识的便不仅仅是几句诗那么简单了，而常常是一定

程度上的情感、认知、价值、审美的共鸣，其背后则是整个中华文明。

这是最为概括的一种说法。而事实上文化的复杂性是人类之复杂、人性之复杂的最好见证。从古希腊的“摹拟”说、“净化”说或“有害”说（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到我国古代的“载道”说、“言志”说或“倡优蓄之”的“雕虫小技”说、“玩物丧志”说；从西方的“认识功能”、“愉悦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和形形色色的形式观、游戏观、虚无观等等到我国的“兴、观、群、怨”和“无用之用”甚至“五色五音”的“目盲”、“耳聋”之说（《老子》）等等。虽然程度、侧重不同，但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及文学（人类）的矛盾特性。同时，作为精神产品，东西方文化在功利性和非功利性方面的认知常常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曰文化于饥肠辘辘者无用，犹如科学于急功近利者无异于夏炉冬扇，其证据乃是诗或相对论不能当饭吃；另曰文化于饥肠辘辘者有用，其经典证据则是革命文艺或诸如托尔斯泰者（用文学让贵族放弃某些特权）在时代变革中的巨大作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次，文化多元和相对论既是始，也是终。无论始终，现实已然触目惊心。从花样繁多、助长虚荣的选美选秀，到丑态百出的所谓“美女作家”和“少年作家”，从充斥荧屏

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木子美和芙蓉姐姐……花边和八卦争奇斗艳。无怪乎有人要说，“不是我不懂，是世界太疯”。

总之，各种不同和怪异构成了目前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这种表面人人平等、自由的多元状态（也即文化全球化）既是跨国资本所乐意看到和刻意追求的，但同时也是弱势文化和相对弱势的经济体系进退维谷并竭力有所取舍、有所持守的现实反映。这等于将前所未有的挑战摆在了每一个中国文化工作者前面。也就是说，多元文化和自由一样，对于弱势文化终究意味着一种可怕的两难性：倘使我们不注意保护自己的文化特征、力挺多元文化，就有可能被强势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主体意识、民族意识并最终损害民族利益；但是倘使我们过分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独尊民族文化，就有可能闭目塞听、夜郎自大，而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是有过惨痛教训的。在这样的情势下，知己知彼地拥有世界眼光、进退中度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该是何等的重要，又是何等的艰难。

回到经典这个话题，无论它多么莫衷一是，相当程度上的共识一定是毋庸置疑的条件。就历时与共时而言，但凡经典总要做到此时彼时、此地彼地相当读者群体的认同。为此，它必得超越纯粹个人的狭隘时空，以至对人生、人性有较为普世的终极探索

和追询、对社会责任和社会良知有较为忠诚的履行和关注、对人类美好价值和审美理想有较为执着的追寻和守护。在这方面，西班牙当代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

二

西班牙当代文学是当代世界文学多元共生现象中令人瞩目的一景。其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在世界文坛的骄人成就和巨大影响，其次则是因为它对于我国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首先，由于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西班牙作家是当代西方文学狂欢，乃至世界文学狂欢的迟到者，既没有赶上二战以后席卷西方的解构风潮，也没有赶上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兼收并包、来者不拒的文学热情，结果倒是轻装上阵、后来居上，在自己的这块相对的处女地上勾勒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就是说，相对于其他西方作家而言，西班牙作家明显少了一些包袱；相对于我们的作家，他们又多了一份冷静。同时，和我国一样，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闭关自守，西班牙对于世界、世界对于西班牙都相对陌生了，于是彼此也自然多了一些新鲜与好奇。

其次，西班牙小说的双重回归，即回归情节、回归现实主义

又非常契合当下中国文学的走向。经过上世纪 90 年代先锋文学的骚动，我国文学正在以较为冷静的态度开始着类似的回归。

且说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佛朗哥的寿终正寝，西班牙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首先，西班牙王室和政府的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几乎使西班牙一夜之间“走向了未来”；其次，由于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渊源和经济、贸易、旅游等方面的联系，西班牙迅速融入欧洲大家庭并全方位地与世界接轨。在历史剧变面前，西班牙人民显示出了超凡的定力和非同寻常的应变能力。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接受现实，参与变革。西班牙作家则“传统地”担任了人民喉舌的角色。相形之下，邻国葡萄牙的改革却显得步履维艰，文坛也是一片黯淡。明证之一是萨拉马戈因为文学创作和政治信仰而受到了教会与政府的非难，结果却在西班牙受到了保护。进入 80 年代以后，西班牙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文学事业也蓬蓬勃勃。文学史家把 20 世纪最后二十几年的西班牙文学粗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解禁”时期，其中的主力军是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的“复出的一代”和“崛起的一代”（单是这些名词，就不难使人联想到刚刚摆脱“文字狱”的 80 年代的中国文坛：一大批老作家被摘掉帽子，从监狱和牛棚回到自己业已生疏的工作岗位；一大批年轻文人四面逢源，脱颖而出

出)。所谓“复出的一代”是指成名于佛朗哥时代的作家，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过独裁政权的迫害。有些作家几乎在监狱里度过了半生。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塞拉(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利维斯和托伦特·巴耶斯特尔，他们分别于1996、1993和1985年获得塞万提斯奖。此外，流亡归来的圣德尔、阿拉亚、罗萨·恰塞尔、圣普隆、费尔南德斯·桑托斯和玛利亚·希罗内利亚等迅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作家的特点是生活积累丰厚，对现实有很强的责任感。尤其是那些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年富力强的小说家，如戈伊蒂索洛、贝内特和马尔塞等，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戈伊蒂索洛同时把笔触伸向了(佛朗哥时代的)两个禁区：性和同性恋问题。贝内特用侦探小说的形式及普鲁斯特式的长句子，把开放的西班牙社会描绘得犹如迷宫一般。马尔塞几乎是前两位的有意无意的综合，即把性和敏感的政治捏在了一起。

“崛起的一代”涵盖面更广，盖因他们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涵括了上世纪中叶以来降生的几代作家；而且正值世界进入多元时代，传统的文学评价体系早已土崩瓦解。于是，他们几乎一直以群体的形式为世人所知，一个个既多产又畅销，国内外声誉极隆。关于这一批作家，首先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佩雷斯·

雷维尔特、维拉-马塔斯、莫利纳·福伊克斯、巴斯克斯·蒙特阿尔班、穆纽斯·莫利纳、里奥斯、马德里、米利亚斯、费雷罗、盖尔本苏、梅里诺、洛佩、蓬波、马利亚斯、甘达拉、门多萨、莫伊克斯、阿桑科特及女作家涂斯盖茨、费尔南德斯·古巴斯、加西亚·莫拉雷斯、蒙特罗、托雷斯、恰孔、雷加斯、林多、马约拉尔等。

如今西班牙文坛四世同堂，可谓色彩纷杂。除了前面说到两个回归，恐鲜有概念可以涵括其创作特征。而恰恰是这两个回归直接推动了西班牙小说市场的繁荣兴旺。顺便说一句，文学的繁荣促进了影视业的发展。八九十年代西班牙电影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它拥有一片丰饶的文学土壤。就像我们的第五代导演的成功，当首先归功于“寻根文学”；绍拉、阿尔莫多瓦等著名导演的出现，也无不受惠于当代西班牙小说。

以上种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基本上还如乌有之乡。然而，他们对于我们又或许比任何一种文学更具有借鉴意义。因为他们的前面也曾是一片文化沙漠，因为他们的面前也曾有一个陌生了的世界。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开放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中间伴随着社会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颠覆与重构。相比之下，我们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渐进。尽管西班牙与世界（其实

主要是欧美)接轨有传统和语言方面的优势,但从承受角度看,惊人的变速足以将这些优势消解殆尽。三十年来,西班牙人的惊喜与惶恐、欢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在几代作家的笔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对于同处在变数中的国人来说,应当说是弥足珍贵、不可多得的参照系。

本丛书遴选的四位作家,都是近年来活跃于西班牙文坛的标志性人物。

一、胡安·何塞·米利亚斯(1946 -)曾以富有理论色彩的小说闻名遐迩,但近年也开始在情节上做起文章来。他的新作《对镜成三人》(2006)几乎可以说是现代版《包法利夫人》或《安娜·卡列尼娜》,所不同的是米利亚斯以网络的“虚拟性”取代了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纯悲剧色彩。且说劳拉和胡利奥结婚以后过着正常的生活。单纯、友善、务实的男主人公胡里奥经常遭到邻居曼努埃尔的嘲弄。后者故作清高,常使胡利奥下不了台。正在胡利奥忍无可忍之际,妻子竟突然提出了分居要求。她说她再也受不了他的庸俗无能了。随着情节的发展,曼努埃尔惨遭车祸,正在中国当大使的父亲赶回西班牙料理后事。这位大使父亲的出现使胡里奥不得不承认贫穷只会带来猥琐与庸俗,唯有富裕、“优雅”的上层人士才有资格高谈阔论并且“神圣不可侵犯”。但